

中国教育叙事研究丛书/丁钢 主编

学生生活图景：

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

孙崇文 著



Prospect of Students' Daily Life:
Educational Conflic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ecular World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素描分册

学生生活场景：

静物与人物组合写生

（素描）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素描分册

孙崇文 著

学生生活图景：

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刘明堂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 / 孙崇文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6

(中国教育叙事研究丛书/丁钢主编)

ISBN 978 - 7 - 5041 - 3806 - 4

I. 学… II. 孙… III. 基督教—教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史—研究—中国 IV. G64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5898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 - 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19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62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 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总序

丁 钢

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教育都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了解教育，并且期望发展教育，就必须了解和理解这种生活方式。当然，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尤其当其以经验事实的方式流动的时候，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图景。而要揭示这幅丰富多彩的教育图景，教育叙事研究就会成为重要的理论方式。

在教育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思想与语言的错位：二者的发展总是不协调。一方面不断有新的想法出现，另一方面这种想法却由于理论语言传统的限制而很难加以表达。而今教育叙事研究的流行，并非出于追求新颖，而是深切地感到出于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人群、事件与感受只能借助于叙事语言才能表达清楚，在事实描述阶段就对语言进行刻意的理论化加工，必然会扭曲日常生活事实的本来面貌。对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来说，知识往往是以“权力”的形式发生作用，人们很难进入那些描述、界定他们的理论话语体系，他们只能承受理论话语的界定。从这一意义上讲，叙事语言还承担着这样一种使命：使普通读者能够参与进来，并依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对叙事文本进行评价。叙事文本所揭示的事实性内涵也就会随之扩大，因为某一次叙事并不能达到对事实的充分表达，但是读者的进入，并与文本中叙述的事实

进行对话，却可以使文本逐渐接近事实，而要保证读者可以对话，就需要使用读者习惯的生活语言。

就目前的主流学术研究而言，显然仍是理论语言一统天下。即便描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理论语言的表述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让我们重温加登纳的话吧：“日常生活给我们的纷繁复杂的情形，也间接地反映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的本质中。从实践的观点看，语言的主要用途包含了交流信息，表达要求，给出指示，提出建议等等。它的作用就是要通过下列途径，使行动变得容易，即把世界的各种特征都加以分类，以使它们得到辨认，并把它们与我们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而且，因为生活是极其复杂的事情，如果我们要使生活具有意义并达到我们的目的，就需要不断地简化我们的生活，同时不断地重新适应我们的生活，这样，我们的语言就必须是可选择的，可变动的，可调整的。”（加登纳：历史解释的性质 [M]。江怡，译。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6-7）

当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而需要解决的无数多变的问题时，会根据常识行事，而根据常识行事，就意味着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在这里，“常识”则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的诀窍和权宜之计，它们是松散而缺乏严格性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日常生活语言的这种本性而可以像哲学家般地对日常生活的语言加以精确化和严格化，结果反而不能适合其作用，并导致理解的困境。“常识”不同于“专门知识”，对于日常生活意义的理解，却可能产生于“常识”和“专门知识”的对比语境之中。这构成了一种语言的张力，尤其对于教育研究而言，当我们关注日常教育实践的活动时，就可能产生自身的话语方式。而这正是我们关注教育叙事的目的。

我们愿意把这种探究看作是一种教育研究的实验行动。当然，这并不仅仅意味对教育叙事的方法实验，更在意对于教育研究本身乃至教育学科发展的实验尝试。也不单纯是对于教育叙事的行文风格和话语的兴趣，更多的是，我们实在难以抗拒蕴藏其中、并对教育学本身意味深长的发展取向和趋向的诱惑。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我以为，教育叙事的研究兴起，已经超越了对于西方叙事方法的借鉴，或者本土化的含义，而在实践中满怀着对于教育学自身理论建构的深情厚

谊。所谓：“言于此，意在彼”，确是这种心情和意愿的真实写照。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国教育叙事研究丛书》由五部著作构成。

丁钢所著的《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力图为教育叙事研究建立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迄今为止，有关教育叙事研究的论述很多，但是系统阐述教育叙事研究的专著缺场，使得许多问题显得模糊不清。在此书中，通过对西方叙事理论和方法的梳理反思，尤其是对教育叙事理论资源的辩证分析，提出把教育叙事的理论建立在教育叙事与日常教育实践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廓清其方法论及其意义。并指出了作为理论探究的教育叙事研究的五个方面的理论范畴，从而为教育叙事探究奠定了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而另外四本著作，则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教育进行了教育叙事的研究。

许美德所著的《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作者是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教育的国际知名专家，她的这项研究历经数年之功，访谈了当代中国知名教育家如刘佛年、李秉德、朱九思、王承绪、潘懋元、汪永诠、顾明远、谢希德、鲁洁、叶澜等，从叙事研究的角度对他们从童年至一生的教育、生活、学术和领导的经历作出了深入的研究。结合他们个人的发展中国大学及其教育发展的历程，以个体和群体相结合的经历勾画出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复杂多变和丰富多彩的发展图景，精彩诠释了在中国社会文化及其教育发展中，通过这些知名教育家所呈现的中国教育发展取向和独特命运，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富有魅力的研究视角和领域。

张素玲所著的《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揭示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抑或说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所伴随的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倡导，使女子教育被纳入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主流话语中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此书指出女性并不只是被定义和想象的性别群体，在对女大学生家庭、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的研究中显示，女性并没有完全服膺精英知识分子关于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的倡导。女子教育目标、知识分子热切的对于女性的期望，与女大学生自己对于独立生活和职业的追求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距离。来自不同环境中的女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她们的故事也显示了，教育对于她们内在的精神品质的影响使她们有着同样的对独

立、平等的追求和坚持,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也同样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力。

孙崇文所著的《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认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伴生物,大学生包括基督教大学的生活史研究无疑也是一把帮助我们解读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钥匙。作者结合学生不同的求学经历及其个人成长作具体的考察,关注学生个体的早年经历及其入学的目的,尤其关注不同个体在家世、地域、性别和年代等方面所存在着的显著差异,并力图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学生们在基督教大学求学期间的生活场景,如基督教大学学生们的宗教生活、学习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等。指出基督教大学在华发展的数十年间,学生们是如何处于这种极端对立与冲突的矛盾漩涡的中心,他们的内心深处所承受着这些极端对立与冲突的评价标准的拷问,“我是谁?”、“我究竟应该成为谁?”以及在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之间,用他们自己的言行所做出的抉择。

王枏等著的《教师印迹:课堂生活中的叙事》,这是该书作者们对中小学教师课堂教学生活进行长期现场观察和进行田野工作的研究成果。此书运用叙事研究的方法,从课堂观察入手,对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教学进行研究,通过故事描述教师所从事的课堂教学活动,使人们熟悉又陌生的课堂生活得以展现,从而揭示了那些看似平常,甚至教师本人习焉不察的行为背后隐含的教育内涵,在课堂实践中寻找教师确认的意义链接,并解释教师所从事的课堂教学活动的意义。

这是我国第一套以教育叙事研究中国教育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图文并茂的著作系列。此系列书稿选题独特新颖、研究方法和理论前沿,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对教育研究的导向性。此系列出版同样也是基于主编者在近年来以教育叙事研究推进教育经验的理论研究,以及指导这种新颖研究方式所获得的具体成果。我们真诚地期望能够为推动中国教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并由此提升中国自身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而尽上一份微薄之力。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部 嵌入与融合：基督教大学在 中国的发展及其学生状况

第 1 章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嵌入与融合 // 35

- 一、从传教机构到“戴帽子学院” // 36
- 二、重组与提高：中国基督教大学的“黄金时代” // 43
-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与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 // 51

第 2 章 出身与愿望：基督教大学生背景分析 // 64

- 一、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知识群体” // 64
- 二、学生出身 // 72
- 三、入学愿望 // 80

第二部 灵与肉：基督教大学生的生活

第 3 章 基督教大学生的宗教生活 // 97

- 一、基督教大学宗教生活规制 // 97
- 二、“神形不一的基督教徒” // 108
- 三、从“基督化人格”的感召到“宗教救国”理想的服膺 // 114

第4章 基督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 128

- 一、从书院到大学 // 128
- 二、沐浴西学的人们 // 140
- 三、走进科学的殿堂 // 148

第5章 基督教大学生的政治生活 // 157

- 一、“中国的西点军校” // 157
- 二、民族意识的大觉醒 // 163
- 三、作为中国人而抗争 // 171

第6章 基督教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 185

- 一、中西汇聚的校园环境 // 185
- 二、封闭社会的开放空间 // 195
- 三、别开生面的文体生活 // 207
- 四、青春躁动的校园恋曲 // 228

第三部 回眸与评价

第7章 结语 // 239

参考文献 // 251

后 记 // 262

CONTENTS

Introduction // 1

Part 1 Embedding and Merging: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its Students' Situation

Chapter 1 Embedding and Merging of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China // 35

Section 1 An early history of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China // 36

Section 2 Reconstruction and Enhancement: "Golden Times"
of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China // 43

Section 3 "The Movement to Restore Educational Rights"
and Chinese Christian University // 51

Chapter 2 Family Background and Wish: Background Analysis on the Students from Christian University // 64

Section 1 A New Noticeable "intelligentsia" // 64

Section 2 The Family Background of the Students // 72

Section 3 The Wish of the Students // 80

Part 2 Soul and Body: Students' Daily Life of Christian University

Chapter 3 Religious Life of the Students from Christian University // 97

Section 1 The Regulations of Religious Life in Christian University // 97

- Section 2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 108
Section 3 From Calling to “Christian personality” to Belief to
“Save the Nation through Religion” // 114

Chapter 4 Learning Life of the Students from Christian University // 128

- Section 1 From the Academy to the University // 128
Section 2 People Immersing in Western Learning // 140
Section 3 Step into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ll-Palace // 148

Chapter 5 Political Life of the Students from Christian University // 157

- Section 1 Chinese West Point // 157
Section 2 Awaken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 163
Section 3 Fighting as Chinese People // 171

Chapter 6 Campus lives of the Students from Christian University // 185

- Section 1 Campus Environment of Combining Chinese
with Western Culture // 185
Section 2 Open Space in the Closed Society // 195
Section 3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 207
Section 4 Adolescent Stories in Campus // 228

Part 3 Conversations in Modern Times

Chapter 7 Conclusions // 239

References // 251

Postscript // 262

导 论

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郭沫若在《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中反复强调“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和武装侵略外,在很长时期中,尤其注重文化侵略的活动。这种侵略活动方式,主要是通过巨额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的(何东昌,1998)^①。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政府便于翌年全面接收了各地的基督教学校。此后,这种思想一直成为我们认识与评判基督教教育包括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基本依据与主要标准,并始终长期而深刻地影响与左右着许多人,也由此导致基督教教育包括基督教高等教育成为国内学术界无人或少人敢于问津的研究禁区;即便有人稍加研究,其研究取向也难以跳出原有的认识框架与思维定势^②。

改革开放以后,有部分研究者开始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眼光投注到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勤加耕耘。在他们的带动与影响下,目前中国基督教教育尤其是基督教大学教育的研究,正日益得到来自各个学科领域众多学者的关注与参与,

^①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往往还习惯于从“帝国主义在华进行文化教育侵略活动”的角度着眼来开展教会教育的研究。比如说,虽然李清悚和顾岳中两先生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以来上海教会教育的一般面貌,但其书名——《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依旧清晰地向我们读者透露出作者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样倾向的出版物还有李楚材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等。

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①。

一、教会大学：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误读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使用“教会学校”等称谓，用以具体指代鸦片战争以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英、美、法等国通过教会在中国设立的教育机构。1925年，有人在《基督教教育》杂志上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教会学校的特性”的文章，强调“教会学校是一种教育机关，是由基督徒创办的，并且根据基督化的精神办理的”（李楚材，1987）^②。事实上，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我们知道早在1897年就已经有人开始明确使用“教会学校”这样一种称谓了。所谓“教会大学”则专门指称其中那些具有高等教育办学性质的教会学校。近年来，学术界出版了多部以中国教会大学冠名的研究专著，如由曾钜生翻译、杰西·格·卢茨撰写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章开沅、林蔚主编的《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顾学稼等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谭双泉的《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吴梓明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章开沅、马敏主编的《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董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与建筑形态的构成》和徐以骅的《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等等。至于以教会大学冠名的专题研究论文则更多。

然而，根据徐以骅的研究，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竟找不出一所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教会大学”。徐以骅认为，在英语中基督教教会大学先后有 Miss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和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这两种称呼，按字面直译前者指差会大学，后者才是教会大学（或基督教大学）。差会和教会的内涵不尽相

^①参见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梅川“我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动态综述”（《宗教》1997年第1、2期）、李金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之兴起及其发展”（《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1998年第1期）、陶飞亚“1949年以来国内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评”（《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1998年第1期）和顾卫民“大陆的中国天主教研究概述”（《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1998年第1期）等文。

^②周之德：“振兴学校”，最初发表在1897年8月《中西教会报》第3卷第32期上，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37页。

同,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差会指的是西方教会派遣到中国来传教的各宗派团体;而教会则是由中国本国信徒按其信仰之宗派组成的团体,在法理上它是独立的法人团体,并不隶属于任何国外的宗教组织。就形式上而言,立案之前教会大学与中国教会在地位上是“平起平坐”的,都处于西方差会的管理之下,因此准确的称呼应是差会大学;而在立案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成立了董事会,由信徒担任校长,至少在名义上摆脱了差会的控制,而与中国教会也依旧并未由此发生任何隶属关系。就内容而言,根据耶路撒冷宗教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等机构对教会大学所提出的宗教标准来衡量,19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会大学也基本不合格。由此,他得出了“严格意义上的教会大学在中国竟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的结论(徐以骅,1999b)¹⁹²⁻¹⁹³。类似的观点,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吴梓明等人的论著中得以一见(吴梓明,2003)⁸²⁻⁸⁴。

事实上,“教会教育”或“教会学校”只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种非严格意义上的称谓,相对而言“基督教教育”或“基督教学校”的表述则有着更为明晰的内涵与外延^①,我们理应使用“基督教教育”或“基督教学校”而不是“教会教育”或“教会学校”作为正式的概念(胡卫清,2000)⁴⁶⁻⁴⁸。相应地,“基督教学大学”这一概念较之“教会大学”这一传统的概念也更为适合。在1989年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的吴梓明就已提出了“教会大学”与“基督教学大学”的区别。在他看来,“教会大学是指直接由教会管辖或办理的大学;而基督教学大学的含义较广泛,……包括了一个或多个教会宗派管辖之‘教会大学’,及纯由基督教人士办理之‘非教会大学’”^②。

对于“基督教学大学”与“教会大学”这两个概念的区别,除了强调在举办者

①当然,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人们又往往会混用上述两组不同的概念。我们在“教会学校的特性”一文中却看到,作者实际上也正是在“基督教学学校”这个概念上来理解和使用“教会学校”这一术语的。他说道:“教会学校乃是一种教育机关,是由基督徒创办的,并且根据基督化的精神办理的。其目的:‘是在培养学生,授以相当知识,使他们将来对于个人和社会,均有所贡献,而尤在使他们的生活,都有基督化的精神;这种精神即是基督教教育本身的主动动力’。换言之,其目的:‘是在发展基督化的品格而已’”(原文载《基督教育》杂志第3卷第2期,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54—55页)。

②吴梓明:“从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看基督教学大学应以何种形式为国家教育事业服务”,载章开沅、林蔚等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页。该文后来又收入作者的论文集——《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一书,详见该书第82—84页。

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之外,朱峰还提出了在“基督教大学”与“教会大学”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的其他些许差异。在他看来,“教会大学”一词突出了基督教信仰者的组织、财务及拓展;而“基督教大学”一词则还包含有文化、组织及信仰等多个层次的更为丰富的内涵(朱峰,2002)¹³⁻¹⁵。

其实,“基督教教育”、“基督教学校”和“基督教大学”等概念较之“教会教育”、“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等概念使用的历史也更为久远。我们见到早在1844年12月发行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刊发的一份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提交的年度报告上就正式提出了“基督教教育”(Christian Education)的概念,并直指为其在中国传教的一项重要使命(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1844)⁶²⁵。1899年,谢卫楼更是发表了一篇题为“基督教教育”的专文,集中讨论了基督教教育的内容、特征和目标,从而使“基督教教育”这一概念得到了最终确认。而“基督教学校”(Christian School)一词,在19世纪70年代也得以开始使用。相比之下,“基督教大学”(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一词的使用时间虽稍晚一些,但伴随着20世纪“基督教教育”作为专门术语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之后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当然,相对而言教会人士比教外人士更习惯于使用“基督教大学”一词。我们见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会机构发表的许多教育事业统计资料和教育机构学生统计资料等相关文件,基本上都使用了“基督教大学”这样一种称谓。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的研究者们也开始比较倾向于使用“基督教大学”这一专门术语来表述他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我们看到,2000年前后吴梓明教授领衔主编了一整套汇集了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系列丛书,其中直接以“基督教大学”命名的就有三部,分别是陶飞亚、吴梓明的《基督教大学与近代国学》,吴梓明的《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和刘家峰、刘天路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而其他几部专著也分别以“基督教教育”冠名^①。

①该系列丛书共包括七部专著,除了上述三部专著外,尚有史静寰、王立新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黄新宪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朱峰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以及徐以骅的《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虽然,徐以骅的《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冠以“教会大学”之名,但作者早在成书以前很早就已提出过“严格意义上的教会大学在中国竟是不存在的”结论,是国内持相关见解的代表性人物。沿袭陈说,依旧以“教会大学”冠名其研究成果,实际上也正说明“教会大学”这一习惯称谓在国内学术界影响的根深蒂固。

正是由于学界前人徇名责实功夫的深入,使我在研究之初就能够得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可以比较准确地使用“基督教大学”这样一种称谓。其含义正如前人对于“教会大学”的定义,是“一种教育机关,是由基督徒创办的,并且根据基督化的精神办理的。其目的:‘是在培养学生,授以相当知识,使他们将来对于个人和社会,均有所贡献,而尤在使他们的生活,都有基督化的精神;这种精神即是基督教教育本身的主动力’。换言之,其目的:‘是在发展基督化的品格而已’”(李楚材,1987)⁵⁴。虽然,它在办学实践过程中可能并不是始终直接隶属于某一或多个基督教差会。其实,很早就有人对差会学校、教会学校和基督教学学校这三个不同的概念进行过分析,沈休兰在1932年的《教育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基督教学学校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的文章,在文中就已经提出了要将原来的差会学校改造为教会学校进而再改造为基督教学学校的主张,即“从一个外国人的和教会性质的学校,变成一个中国人的及平信徒的学校”,并将其视为教会学校在中国谋得生机的出路所在(李楚材,1987)⁴³⁵⁻⁴³⁶。

至于基督教,历来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①。就广义而言,基督教是与佛教、伊斯兰教并举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教派,是一切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统称;而在中国,基督教有时也专指基督教新教。本文正是基于对于“基督教”的广义理解来探讨“基督教大学”的。

在杰西·格·卢茨那部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开山之作里,她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主要有16所,分别是由基督教新教创办的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华中大学(Hua Chung University)、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东吴大学

^①杰西·格·卢茨的名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是基于对“基督教”的广义理解而撰写的,她研究的对象包括了基督教新教的13所高校和天主教会的3所高校;而王忠欣的《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则显示该书作者的研究实际上是基于对“基督教”的狭义理解,该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基督教新教的13所高校,而不包括震旦大学等3所天主教会创办的高校。